

中国近代哲学的 宏观透视

□ ZHONGGUOJINDAI

□ ZHIXUEDEHONG

□ GUANTOUI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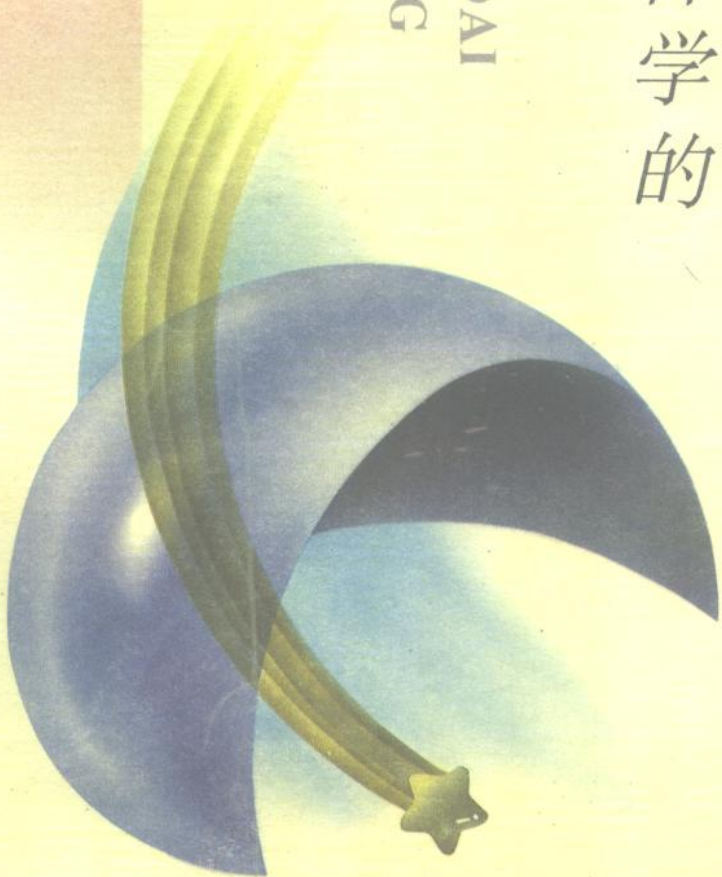


发展与改革丛书

魏义霞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fazhanyuagiae





发展与改革丛书

中国近代哲学的 宏观透视

魏义霞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哈尔滨

(黑)新登字第5号

中国近代哲学的宏观透视

魏 义 霞

责任编辑:李 彤

封面设计:孙少江

责任校对:李守恒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齐齐哈尔铁路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1·插页 2·字数 280 千
1994年9月第1版·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500

ISBN 7-5316-2342-0/C·65 定价:9.20 元

《发展与改革丛书》总序

发展,是现时代的主题。一个社会,生产力越不发达,经济文化越落后,她解决社会问题的可选择性则越小;反之,生产力越发达,经济文化水平越高,她解决社会问题的可选择性越大。人类的出路,在于发展。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展,就必须进行改革。所以,我们这一套丛书命名为《发展与改革》。

积中华人民共和国 40 年之经验,我们得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富国富民的唯一正确道路。欧美的资本主义模式,在中国没有存在的客观基础;照搬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也是此路不通。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痛苦摸索,终于找到了这条光明大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厦,有两块基石,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离开了这“两论”,也就没有中国特色了。为了达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标,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方面持续提高,逐步赶上发达国家。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当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面前进。

大方向、大原则确定了,但是,怎样达到既定的目标,有许多艰难的工作要做。例如,怎样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怎样把发展速度与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一致起来?在改革方面,最

2011/4/02

大的难点在于找到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最终目标的途径、形式、步骤、方法。不少学者和企业家都指出了“承包制”不可避免带来短期行为、负盈难负亏等副作用，但是，又不可能一下子都变成股份制、合作制。那么，在承包制与股份制、合作制之间怎样找到一种过渡形式呢？诸如此类的有关发展与改革的重点问题，有待大家苦心探索、深入研究。

出于历史责任感，我们龙江学派的一些学者高兴地接受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委托，计划在三五年内编辑出版一套《发展与改革》丛书。这一套丛书不是代圣贤立言，或者注解现行政策，也不是单纯介绍外国的学术思潮，而是立足于本国，探讨发展与改革中的新课题，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略尽绵薄之力。

我曾经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张文达社长有一段对话：

我说：要不拘一格出好书，题材不拘一格，观点和文风也不拘一格，唯新唯好。

张社长答：我社要不惜赔钱出好书！

在今日一片赚钱声中，我们听到这种支持学术事业的声音，是多么惊奇，又多么兴奋啊！不少乡镇企业超过国有大企业，同样，小出版社也可以干出大事业，只要有这种为发展学术事业不惜赔钱出好书的方针。

人类学家麦克斯·格拉克曼曾经说过：“科学是一门学问，它能使这一代的傻瓜超越上一代的天才。”本丛书的作者似乎比傻瓜还高明一点，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越上一代的天才呢？

熊映梧

1992年1月于冰城

目 录

第一部 中国近代哲学总论

第一章	中国近代哲学的内在矛盾·····	3
第二章	中国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	20
第三章	启蒙:中国近代哲学的历史使命和基本特征·····	39
第四章	爱国主义:中国近代哲学的主题和基本特征·····	52
第五章	主体性:中国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	65
第六章	中国近代哲学与自然科学·····	78

第二部 主观唯心论:中国近代认识史上一株 不结果实的花

第一章	中国近代主观唯心论的盛行·····	111
第二章	中国近代主观唯心论产生的原因·····	115
第三章	中国近代主观唯心论寻根·····	125
第四章	中国近代主观唯心论的理论特色·····	136
第五章	中国近代主观唯心论的流派分野·····	145
第六章	中国近代主观唯心论的积极影响·····	155
第七章	中国近代主观唯心论的理论误区·····	167

第三部 中国近代哲学与进化论

第一章	进化论与中国近代社会·····	177
第二章	进化论的中国化·····	195
第三章	进化论与中国近代的爱国主义·····	215
第四章	进化论对中国近代哲学的洗礼·····	232
第五章	进化论在中国近代的命运(上)·····	271
第六章	进化论在中国近代的命运(下)·····	276

第四部 中国近代哲学散论

第一章	心:从范畴的演变看中国近代的哲学变革 ·····	297
第二章	相对主义:近古哲学分野的了望孔 ·····	307
第三章	无善无不善:中国近代伦理学说的基础和前提 ···	321
第四章	人生哲学: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内心独白 ·····	331

第一部

中国近代哲学总论

第一章 中国近代哲学的内在矛盾

一、近代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

如果说哲学史与文化史一样,都是人类自身存在方式的展现史,那么,任何时期的哲学都是这一时期的人们对自身存在状态的一种反思和摆脱困境的一种尝试。以此言之,中国近代哲学作为近代思想家们对自身处境审视的结果,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存在。揭示中国近代哲学的内在矛盾,首先要从剖析中国近代社会的内在矛盾入手。

就社会性质而言,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近代的中国人民处于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的双重围困之中,处境之凄、际遇之惨远非人所能堪。中国近代哲学便是近代的人们渴求摆脱这种命运的集中体现。

与西方的民主革命不同,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面临着双重的历史使命,既要赶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者,又要推翻封建主义在中国的专制统治。换言之,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与民族革命同步进行的,它不仅要解决中国如何冲破封建牢笼的束缚而求发展的问

题,而且首先要解决中华民族如何摆脱西方列强的奴役而求生存的问题。这使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双重主题。

在中国近代,反帝与反封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西方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封建主义作为欺压中国人民的两大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已经结为反动统治同盟。一方面,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走狗和工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暴露了他们无耻的卖国嘴脸。正是在清政府的姑息和纵容下,西方列强才可以在中国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表明,要推翻帝国主义,必须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另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证明,帝国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帮凶。为了维护其统治,清政府也借助西方列强的力量镇压本国人民。只有铲除其帮凶西方列强,才能推翻本国的封建统治。并且,帝国主义同样是骑在中国人头上的统治者,只有赶走帝国主义者,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从逻辑上讲,中国近代的反帝反封建是同步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必须同时进行,才能达到目的,两者没有先后缓急之分。

然而,从现实上看,反帝与反封建的同步进行加大了敌人的阵营,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使民主革命的进程一波三折、步履维艰。更有甚者,反帝反封建的同步进行可能引起反动阶级的仇恨和恐慌,客观上巩固了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联盟,使革命力量陷于腹背受敌、四面楚歌的境地。

此外,从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自身状况来看,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力量去拉长战线,从政治、思想、文化的各个战场全面出击发起攻势,只好采取分期分批、各个歼灭的战略。

退而言之,既然环境所迫、命中注定面对本国的封建主义和外

国的帝国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只能集中精力先对付其中的一个,那么,先解决哪一个比较好呢?

假设一:先反帝

反帝斗争是整个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决战,每个中国人都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是取胜的前提保证。换言之,只有每个中国人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血脉相连、发自内心地愿为中国奉献一切的时候,才能在反帝斗争中不计私利、勇于牺牲。然而,几千年来生活在封建牢笼中的中国人民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只知有君而不知有群。孝忠吞噬着爱国,柔顺取代了奋斗。这种价值取向和心理结构使他们对国家的大事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国家是君主一家一姓之私的观念使他们与国家之间划起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同上)的愚民政策和蒙昧主义又使中国人以束身寡过、洁身自好为美德,这种奴隶性格使每一位中国老百姓既不知道国家大事、也不关心国家大事,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捍卫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而竭尽全力。这使中国近代的反帝斗争由于缺乏深厚的社会根基而陷于空想,最后难逃失败的厄运。这告诉人们:要想有效地进行反帝斗争,首先必须向人们灌输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让人们明白国家是每个人的国家。而这正是反封建皇权的思想启蒙所要做的工作。由此看来,先反帝是行不通的,只有先反封建,洗刷人们心中的旧思想、旧观念,才能保证反帝斗争的胜利。

假设二:先反封建

中国近代反封建斗争的任务和目的有三:思想上是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建立自由、自立、自主、自强、自尊的全新人格,为个性欢呼;政治上是推翻封建专制,实行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使资产阶级享有参政权;经济上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促进资本主义商品

经济的自由发展。

然而，帝国主义在向中国发动侵略之时，就涌来了大量的传教士对中国人民进行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腐蚀和侵略，这些干扰了启蒙工作的顺利进行。更何况在帝国主义的践踏下，华人连狗都不如，还奢谈什么人格和自尊！政治上，帝国主义已经霸占了中国的种种大权，中国人民在名存实亡的封建统治者的手中又能夺回多少权利！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实施的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一系列侵略都是为了达到掠夺廉价原料、倾销本国商品的经济目的。为了发展本国的经济，西方列强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压制和阻挠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便使中国永远成为他们的附属市场和原料产地。这一切表明，中国近代的反封建斗争势必要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扰和破坏。只有先赶走帝国主义，反封建才能顺利进行。

这样，在中国便出现了这样的矛盾：反帝反封建同时进行力所不及，而先反帝或先反封建又都行不通。同时，这种两难境地又形成了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是应该先向本国的封建主义为个人争自由还是应该先向西方的帝国主义为国家争自由的矛盾。当这一矛盾以社会意识的形态被反映出来时就形成了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和文化的内在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在中国近代思想家那里是以“独”、“群”的特定概念表述出来的。

在中国近代，担当反帝反封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是以资产阶级为代表和领导的。由于不懂得反帝反封建的内在统一性，更由于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力量，迫于政治上、经济上敌强我弱的局势，他们的思想家们不敢提出同时反帝又反封建的主张。多数人幻想先提高中国人民的身体素质和思想素质，在民智大开之后通过兴民权使人民认识到自己与国家的密切关系，进而激发人们的爱国心与爱群心。这实际上是把反封建置于反帝之前，企图在启迪封建蒙昧中树立国家观念。这套方案不仅把反帝推向了遥远的未

来,而且也冲淡了反帝的急迫性,从而放弃了近代中国的最大敌人——西方列强。

同时,在进行思想启蒙的反封建过程中,近代思想家往往又以中国人民智力低劣、无法实行自治为由收回了他们向人民许诺的自由、自主之权,这使他们启蒙思想中反封建的战斗性遭到极大地扼杀。

另有少数人如陈天华、孙中山等认识到了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最主要的敌人,民主革命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入手。然而,由于对国外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藕断丝连认识不清,最后只能以“革命尚未成功”(孙中山:《遗嘱》)而告终。并且,这一主张由于过分强调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的自由、平等,忽略和钳制了人民大众对于封建专治的自由、平等,甚至呼吁为了国家的自由、反帝的需要和民族的解放而放弃个人的自由,这无疑挫伤了人民大众进行反帝斗争的积极性和政治热情。

中国近代思想家在行动上的失误表明,他们不能处理好反帝与反封建的关系,割裂了二者的内在统一性,使二者成为一先一后、一缓一急、不可同时并举的矛盾对峙。

二、中国近代哲学的内在矛盾及其表现

行动上的困惑发端于思想中的困惑,思想中的困惑又加剧了行动上的困惑。中国近代思想家在行动上体现为反帝反封建的矛盾反映在哲学、思想领域就是启蒙与爱国的矛盾。

所谓启蒙,是指开启长期封建蒙昧造成的中国人的奴性心理和国民性格,塑造富有个性和自强、自信、自立精神,追求自由、自主、平等之权的“新民”。在近代中国被列强吞噬的情况下,所谓爱

国,主要是指拯救祖国于危难,使中国以独立、自主、富强的新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内容上看,启蒙与爱国的目的都是为了争自由、求自主、谋平等,具有一致性。但是,从具体实现上看,或者是先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群体自由、独立,或者是先解决个人的一己之自由、自主,两者往往很难兼顾。这反映了启蒙与爱国的矛盾性。这一矛盾时常困扰着中国近代的每一位思想家。

同时,反帝反封建不仅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而且是一场深入持久的思想变革。为了赶走帝国主义,必须向国人进行弘扬公德观念、群体意识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为了推翻封建专制,又必须向国人输入塑造个性、追求自强自主自尊的启蒙思想。爱国主义的核心是群体主义,强调放弃个人利益而为他人和群体做出牺牲;而启蒙思想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主张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重塑自我形象、追求自我价值。这又使反帝与反封建、爱国与启蒙的矛盾转化为“群”与“独”的矛盾。

“群”指整体、合群、利他,“独”指个体、特性、自力,两者具有一定的矛盾性。中国近代思想家一方面推崇“独”,一方面又弘扬“群”,时时处处都在“独”——“群”的困扰中挣扎。这使“独”——“群”成为他们哲学的内在矛盾,浸透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

1. 个人的主观精神·宇宙的绝对精神

在本体论上,中国近代思想家断言:“宇宙本非实有,要待意想安立为有。”(章太炎:《建立宗教论》)都有夸大“心”的倾向。

被中国近代思想家所推崇和膜拜的“心”,主要是指个人的主体意志、主观感受和情感好恶。对此,梁启超指出,面对同一物境,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例如,“同一月夜也,琼筵羽觞,清歌妙舞,绣帘半开,素手相携,则有余乐;劳人思妇,对影独坐,促织鸣

壁，枫叶绕船，则有余悲。”（《自由书·惟心》）推而广之，千万人乃至无量数人在此，其感觉会有千万种乃至无量数种之不同。至于这些感受到底谁真谁假、孰是孰非，则无可奉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在标准，外部世界究竟什么样？我的主观感觉它怎样它就怎样。

无独有偶。谭嗣同在《仁学》中几乎是用同样的语言和手法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他说：

自有众生以来，即各各自有世界；各各之意识所造不同，即各各之五识所见不同。小而言之，同一朗月皓月，绪风晤雨，同一名山大川、长林幽谷，或把酒吟啸、触境皆虚，或怀远离、成形即惨，所见无一同者。（《仁学》）

在这里，近代的思想家们肯定人人的感受各不相同，肯定人人各有属于自己的世界，肯定人人各不相同的感觉和世界都有绝对的真实性和至上的权威性……这说明他们所神化和夸大的心乃是个人的主观精神。

然而，在论证身心（肉体与灵魂）关系时，中国近代思想家都把灵魂说成是脱离肉体的永恒存在，普遍有崇尚灵魂而藐视肉体的倾向，这给他们崇尚的精神厚厚地涂上了一层客观精神的油彩。

借鉴和利用佛学的“五蕴”说，中国近代思想家指出，人是由物质性的血肉之躯和精神性的灵魂构成的。由各种物质的、化学的元素构成的肉体的存在是短暂的，它最终要分解而消散，而人的精神、灵魂则会不生不灭、万古永恒。康有为认为，人死后灵魂（精气）“可附入他体而神识不昧”（《礼运注》）；谭嗣同宣称：“灵魂者，即其不生不灭之知也”；《仁学》梁启超则断言：“死者死吾体魄中之铁若余金类、木类、炭水粉、糖盐水若余杂质气质而已，而吾自有不死者存，曰灵魂。”（《余之死生观》）

由上可见，中国近代思想家所讲的“灵魂”并非专指个人的“小

灵魂”，而是兼指且主要指人类的“大灵魂”，即人类精神。梁启超坚信：

人死而有不死者存而已。此不死之物……吾曰精神。（同上）

在人死后，这种不死之物（精神、灵魂）可遗传给子孙后代，这就是佛教的“羯磨”、进化论的“遗传”。进而，梁启超又宣称：

生命并不是纯物质的，所以各人所造业，并不因物质的身体之死亡而消灭。死亡之后，业之力会自己吸引自己换一个别的方向别的形式，又形成一个新生命。（《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

去我之体魄有尽，而来人之体魄无尽，斯去我之精神与来人之精神，相贯相袭相发明相推衍，而亦长此无尽，非至地球末日人类绝种则精神无死去之一日。（《余之死生观》）

这就是说，物质性的躯体固然有限，但是，无数个有限足以构成无限。只要还有人类存在，那么，我的灵魂、精神便不会死。躯体一次次地死去了，而灵魂却执著地以别的形式、在别的方向形成新的生命。

总之，中国近代思想家通过论证灵魂不死，把个人的灵魂与群体和国家联系在一起。他们长生不死的“秘诀”就在于用群体、社会之体载我之灵魂。“我”要岿然不死、万古永存，必须与群体和社会联为一体。梁启超指出：

若夫至今岿然不死者，我也；历千百年乃至千百劫而终不死者，我也。何以故？我有群体故。（同上）

这就是说，只要我之家、之国、之群体、之世界不死，我也就能获得永生。不仅如此，中国近代思想家还对“我”进行了新的解释，冲破了个人的局限，在“我”中加入了“众生”、“群体”和“国家”的内容。他们断言：